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汉语国际传播 研究



总第10辑



商务印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办

Sponsored and Edited b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中国知网(CNKI)全文收录

Collected by CNKI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总第 10 辑)

主编 吴应辉

Chief Editor: Yinghui Wu



201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总第10辑/吴应辉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 - 7 - 100 - 16922 - 6

I . ①汉 … II . ①吴 … III .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
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 ①H195.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827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总第 10 辑)

吴应辉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6922 - 6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40.00 元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问：陆俭明 赵金铭 李宇明 崔希亮

主编：吴应辉

副主编：刘玉屏 央青

编辑部主任：马秀丽 吴峰

编委：（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白建华	曹秀玲	陈作宏	邓守信	冯凌宇	冯胜利
郭熙	何文潮	江傲霜	靳洪刚	李泉	李晓琪
李朝辉	刘骏	刘乐宁	娄开阳	孟长勇	孟柱亿
陶红印	田艳	王建勤	王觉非	翁燕珩	吴丽君
吴英成	吴勇毅	姚道中	俞志强	袁博平	曾立英
张博	张和生	张西平	张晓慧	张英	赵永红
周洪波	周小兵	周质平	朱永平		

执行编辑：

江傲霜 李朝辉 刘玉屏 马秀丽（英文）
田艳 吴峰 央青

目 录

汉语教学中心任务的演变与教学法的发展	[美国]俞志强	1
创立综合性水平能力为导向的中文领航项目教学大纲	[美国]何文潮	14
孔子学院在美国: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平台	[美国]萧云	31
海外汉语教师的培训与培养模式研究		
——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王治敏 Lucy Xia Zhao	44
国际汉语教学教师反馈话语研究	任映菲 王珊	55
教师语言分析:如何有效支持并推动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发展	吴瑜	64
借助中国访学者提升美国对外汉语学生在校的协作学习	[美国]梁新欣	79
对外汉语中的古汉语课程文本选择与课程设计	[美国]贺天舒 林铭珊	85
对外汉语中级教材中的话题设计	马丛丛	94
海峡两岸对外汉语教材汉字收录情况考察		
——以《新实用视听华语》与《新实用汉语课本》为例	孟繁杰	102
海外儿童汉语教材词汇分类研究	刘薇 黄启庆	110
汉字特点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启发	印京华	122
身份认同视角下汉语学习策略的叙事研究	陈钰	128
演绎法和归纳法在汉语语用教学中的对比分析	齐雪丹	136
中亚初级汉语学习者词汇学习特征研究	江宇豪 张朝阳	145
中文书写系统的跨学科教学:创建一体化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	李煜	156
语言经验对听者感知汉语外国口音严重程度和言语理解度的影响		
吴明哗 王书琪 何婉玉	163	

CONTENTS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Goals and Methods	[USA] John Yu	1
Create a Comprehensive Proficiency-oriented Chinese Flagship Curriculum	[USA] Wayne Wenchao He	14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SA: Platform of Promoting China's Soft Power	[USA] Yun Xiao	31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s —Tak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as an Example	Zhimin Wang & Lucy Xia Zhao	44
Teachers' Feedback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Yingfei Ren & Shan Wang	55
Analysis of Teacher Talk: How to Effectively Scaffold and Push Learners to Proceed to the Next Proficiency Level?	Yu Wu	64
Collaborating with Chinese Visiting Scholars to Create a Learning Community in Advanced Chinese Courses	[USA] Hsin-hsin Liang	79
Text Selection and Curriculum Design for Classical Chines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SA] Tianshu He & Mingshan Lin	85
A Study of Topic Design Principles for Intermediate-level Chinese Textbooks	Congcong Ma	94
A Surve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CFL Textbooks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The Case of <i>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i> and <i>New Practical Chinese</i>	Fanjie Meng	102
A Study of Overseas Children Chinese Textbooks Basing on Thesaurus	Wei Liu & Qiqing Huang	110
Gain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John Jing-hua Yin	122
A Narrative Study on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Yu Chen	128
Contrasting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Teaching of Pragmatics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Xuedan Qi	136
A Study on the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bulary Learning in Primary Chinese Learners of Central Asia	Yuhao Jiang & Chaoyang Zhang	145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Towards an Integra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urriculum	Yu Li	156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Background on Listeners' Perception, Intelligibility and Comprehensibility of Accented Chinese Speech	Minghua Wu, Shuqi Wang & Wanyu He	163

汉语教学中心任务的演变与教学法的发展

〔美国〕俞志强

提 要 文章用纵向的思路探讨了教学中心任务与教学法的关系,考察了这种关系的历史演变,并对目前教学法的状况做出了评估:既介绍了历史上教学法的局限和优点,又对语言学习的两个中心在顺序上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教学法;教学任务;文化;方法论;后方法论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Goals and Methods

〔USA〕John Yu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go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lthough teaching methods are determined by many factors, teaching goals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This study also evaluates various teaching text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eaching theorie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on the order of the two teaching goals in language learning.

Key words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goals, culture, methodology, post-method

引言

Bell(2007)提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问题:教学法是不是死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论肯定与否,都表现了教学法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大转变:不少学者和教师的注意力从过去对最佳教学法的关注转移到现在对走出教学法的探索上来了。在对教学法是否已经死亡的问题还未找到统一的答案之前,学术界的意见却早已出现了撕裂,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但是,我

【作者简介】俞志强,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执教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贝鲁克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法学、音位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法。

们今天还是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从历史上有关语言教材的一些蛛丝马迹中，看看教学法演变的过程，然后再来审视教学法的生死存亡。

一、教学的中心任务

教学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走向新生，但也不排除走向死亡的可能。当我们走进当前的教室，所看到的教学法不但跟几十年前的大相径庭，就是跟十几年以前的也已经迥然不同。教学专家的研究、教师的总结归纳、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都为教学法的进步带来了前进的能量。学生的素质、学习的动机、学习的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也影响着教学法的演变。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交流愈加通畅，更是加速了教学法的进步和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教学法的演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共同推进、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所决定的。

虽然教学法的进步是综合因素产生的结果，但是其中的一个特定因素引起了我们很大的研究兴趣。这并不是因为该因素有任何惊人的色彩，而是因为该因素自始至终在暗中不断地引导、推动新教学法的创造和改进。几乎所有教学法的改进都离不开该因素的影响。它好像是起伏的地势，而教学法只是一条铺在地上的道路。道路随着地势而起伏、转向或延伸。这个特定因素就是教学的中心任务。

教学的中心任务，既是教的问题，也是学的问题。它是老师应该主要教什么的问题，也是学生应该主要学什么的问题。很多其他的科目，注重的对象是相对稳定的。比如，从青蒿里提炼青蒿素。作为被提炼的对象，青蒿是不变的，而提炼的方法却是不断改进的。又比如，在深海勘探石油，作为被勘探的对象，石油是不变的，而打井的方法却是不断改进的。然而，教学法却不同，虽然表面看起来都是在研究教语言的问题，但是在教语言的过程中，教学的中心任务是不断变化，甚至是转移的，而这种变化和转移同步影响着教学法的变化和转移。

二、中国历史上的语言教材

教学中心任务的变化，也就是教什么、学什么的变化，虽然没有很多直接的材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视历史上不同的语言教材来观察。历史上即使没有专门阐述语言教学法理论的著作，前人的教学理念仍然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教材来体现，这好像我们观察孔子编写《春秋》的态度。有的时候，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他对人、事、物的看法，但是他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的所谓“春秋笔法”来间接观察。这种间接的观察往往是我们探索前人态度唯一的途径。虽然那些教材与我们今天的国际汉语教学教材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们是我们今天可以观察到当时情

况的唯一线索。

(一)《千字文》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521)编纂、由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千字文》。所谓“文”在唐代以前指押韵和对仗的文字,不对仗、不押韵的文字称为“笔”。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并命周兴嗣编纂成文。全文四字一句,对仗工整,富有文采。



图1 唐欧阳询书《千字文》(纸本,纵25厘米,横304.8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根据我们现在的考证,三国时代的钟繇(151—230)写过最早的《千字文》,但因为战乱,钟繇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后来,著名书法家王羲之(303—361)又编撰过一篇《千字文》,然而据说文理音韵都不理想。根据李伟的《尚书故实》记载,到了梁武帝萧衍时代,梁武帝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命其大臣殷铁石(生卒不详)按照王羲之的碑刻字迹拓出一篇新的《千字文》。由于殷铁石的《千字文》只是一千个互不重复的汉字,不成文理,梁武帝命周兴嗣重新将这一千个字改编成有意义的句子。《太平广记》载:“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关于《千字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参阅刘宏毅的《千字文讲记》。

现在看来,《千字文》编撰的本意大概是学习书法,故原作的生成是基于王羲之的书法。《千字文》出现以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广为流传,并被当作儿童学习汉语或者汉字的课本。可以看出当时儿童学习语言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会汉字,这样的课本强调汉字是学习的根本。这大概是我们现在汉语教学里“字本位”流派的原始起源。不过,《千字文》比起后来的一些作品还不是最极端的,因为《千字文》毕竟有内容、有文采,采用了押韵、描写、排比等手段,并非简

单的汉字排列。尽管有词、词组、句子等超越汉字的结构单位,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千字文》对汉字学习的强调,因为作者在选取汉字的时候,特意避免重复,显示出作者在编撰的时候把汉字放在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二)《百家姓》

《百家姓》在认字上走得更远了。据说在宋以前就有了《百家姓》的各种版本,到了北宋初期,经过江南钱穆王的整理,出现了比较有权威性的《百家姓》版本。我们现在看到的《百家姓》全名应该叫《增广百家姓》,收集了大约411个汉族的姓氏。后来经过补充,姓氏的数量增加到了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宋朝皇帝姓赵,而钱穆王姓钱,钱穆王又是宋朝藩属国的国君,故《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篇,而不以姓氏数量多寡为顺序,这是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一种表现。

百家姓			
趙	錢	孫	李
周	吳	鄭	王
馮	陳	褚	衛
朱	秦	尤	許
孔	曹	嚴	華
戚	謝	鄒	喻
雲	蘇	潘	葛
柏	水	竇	章
金	魏	陶	姜
何	呂	施	張
鄧	鮑	史	唐
魯	韋	袁	柳
苗	鳳	昌	馬
奚	范	任	袁
柏	彭	俞	柳
水	郎	龔	史
竇		史	唐
章		龔	

图2 《百家姓》插页

《百家姓》是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主要用来教孩子识字。它虽然朗朗上口,却并无一个日常对话的句子。《百家姓》继承了《千字文》重视汉字的特点。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把识字、写字作为语言教学主要目标的传统。

比较《千字文》和《百家姓》,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些共同特点:(1)由于当时缺乏对识字和学习语言之间区别的清醒认识,它们都主要是为儿童学习汉字而作,而不是专门为儿童学习语言而作,是一种兼有启蒙、识字、学文化综合功能的教材。(2)作为儿童学习的教材,两者都把学习语言的重点落脚在字的学习上。换句话说,当时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学会了识字写字,那么语言学习的主要任务便完成了。这反映了当时的人对学习语言的一种模糊概念。(3)作为教材,即使是以字凑句,甚至有的只是一些没有主谓宾的汉字排列,也都编得有声有色,朗朗上口,容易记忆。(4)两部作品都非常注重文化因素。《百家姓》对汉族姓氏的总结以及呈现出的政治因素对姓氏排列的影响、《千字文》里的谈天论地和综述历史,都反映出作者赋予了教材

丰富的文化信息。(5)两者都是四言作品,也就是四个字一句,完全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绝大多数是四言诗。“诗言志”是儒家诗歌学说最重要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千字文》《百家姓》都用四言,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严肃性的重视。

我们要看到这种重视字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中国语言的分析。一个字,可以同时或分别是一个音节、一个词素、一个词,甚至是一个句子的综合代表。以字为中心的看法对后世的汉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现代的方言调查,仍有不少学者拿着以《切韵》音系为主导的字表,让被调查者读。汉字与汉语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至今很多老师对这一点仍缺乏重视。

当然,我们应该把语言学分析中的“字本位”与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加以区分,因为方便语言学分析的理论与方便语言教学的理论并不完全等同。在语法学上,“字本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氏文通》里基于欧式分析的“词本位”的一种反拨,更显出汉语的特点。但是字并不是语言本身,除了汉字,大多数现代教学法研究者都认为学习语言有更多的内容和重心。虽然学好汉字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学好汉语的唯一条件。

(三)《三字经》

南宋时代(1127—1279)的《三字经》与先前的《百家姓》与《千字文》合称“三百千”。从语言教材的角度看,《三字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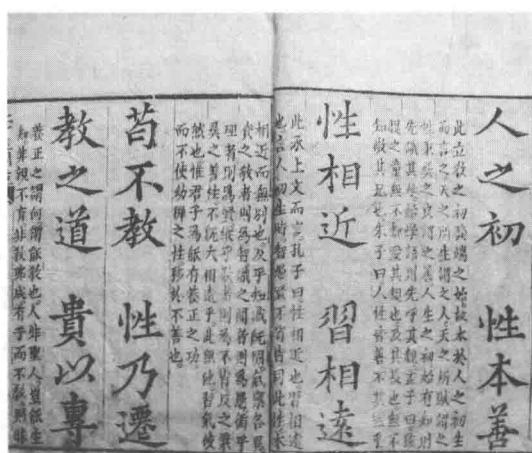


图3 《三字经》插页

《三字经》不再讲求汉字使用的单一性,而更多注重句子和内容,为了照顾句子和内容,同样的汉字可以重复出现。比如,图3开篇的前八个句子里,“相”和“之”字都重复了两遍,而“性”字竟重复了三遍。同字重现的现象说明,只要内容需要,使用同样的字是没有关系的。这说明汉字要服从句子和内容的需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了内容的重

要性,当时很可能最要紧的是把课文背下来,不管是否理解,只要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便是学习成功的标准。古人是怎么教和学《三字经》的,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但是,从胡适的一段话里,我们可以了解大概的情况。胡适在《慈幼的问题》里说:“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死书’。”这样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死读书”的现象。从学生的“死读书”,我们不难猜到老师的“死教书”,毕竟学生做什么都是老师要求的。

(四)《弟子规》和《增广贤文》

清代(1636—1912)出现了一本《弟子规》,一般认为它的作者是当时的秀才李毓秀。李秀才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学问相当不错。因为他的主要活动是教学,故而可以算是当时的一个教育家。李毓秀先编写了《训蒙文》,后经贾存仁修订,更名为《弟子规》。《弟子规》继承了过去韵文的特点,三字一句,两句一韵。内容上教导弟子怎么按照孝、悌、仁、爱的标准待人接物、遵守礼仪。《弟子规》作为教材以后,广泛流传,有的地方把《弟子规》列为必读书籍。下引开篇数行: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

出必告,反必面。

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

从《千字文》到《弟子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材的教学重点从重汉字到重句子、从轻内容到重内容的转变。这种倾向尤以明代的《增广贤文》最为突出。《增广贤文》又称《昔时贤文》《古今贤文》,出现在明朝的万历年间,作者不详,但清代同治年间的儒生周希陶对它进行过重订。《增广贤文》的特点是虽然句式仍为对仗,但是句式更加丰富。思想方面以道家的观点为主,掺有儒家的学说,不少句子采用成语,有的简直就是大白话,如“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上人间,方便第一”等等。《增广贤文》虽然在内容和句式上有所进步,但在篇目结构上有些杂乱。

纵观以上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教材,如果说《千字文》《百家姓》是以突出汉字而得以广泛流传,那么《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则是以突出内容而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些中国古代的教材,虽然不是专门的语言教材,更不是对外汉语教材,但是它们兼有学语言、识字、学文化、宣传道德的综合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与语言教材有重合的部分。那些教材虽然初期的中心在于识字、写字,后期慢慢对内容有所加强,但是都没有抓住语言学习的真正中心。因此,基于上

述教学中心的教学法,无外乎朗读、背诵、抄写等。至于是否理解作品的含义,是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实际的交际能力,很少成为关注的对象。张美兰(2006)指出:“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没有严格的分科。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研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其基本教材。这一类儒家经典之外还有为帮助读经所编写的识字教材,如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从集中识字开始。蒙童能够识记这些汉字,就为阅读和写作训练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些教材是以汉字教学为中心,侧重读写训练。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识字是为了读经,读经是为了科举考试。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符合教育科学的汉语语言教学,更不适合用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传统的启蒙读物曾经在古代韩国、日本汉语学习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国外的传统汉语教材

(一) 朝鲜、日本的教材

古代专门为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人编写的教材中,比较出名的有朝鲜的《老乞大》《训世评话》和《朴通事》。《老乞大》里面的内容已经接近当时的汉语口语。汪维辉(2005)谈到李边(1391—1473)曾经批评《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音,非纯汉语,又有商贾庸谈,学者病之”,进而编撰了《训世评话》。这些教材的教学中心已经完全从字转移到口语上来了,有的还有对话,给教学法中采用对话的方法提供了必要条件。其中《训世评话》的语言带有一些浅显的文言口吻,对语篇有了明显的概念。文中一段一段的小故事,各自独立,有头有尾,算得上结构完整。



图 4 《老乞大》插页

日本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自5世纪始,古代汉典就开始在日本流传。后来包括《千字文》在内的作品在日本不但有了日文校注,还有了日语的训读。明代以后,日本也产生了一些为学习汉语口语而编写的教材,有《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沪语便商》《沪语便商意解》《沪语津梁》《官商须知文案启蒙》《生意集话》《台湾土语读本》等,其中尤以《官话急就篇》为代表。

(二)德范克教材

现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材,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学家约翰·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11—2009)编写的 *Beginning Chinese* (1963),中文名《初级汉语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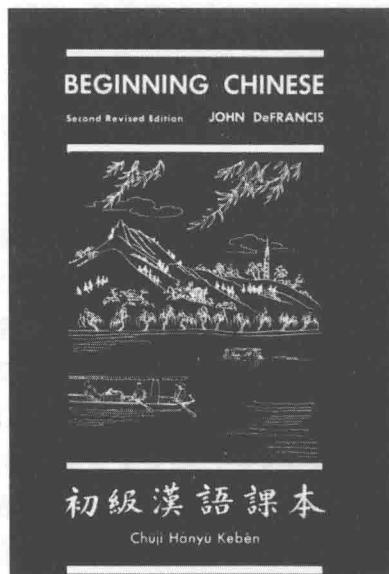


图5 德范克教材封面

德范克的教材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现代语言教学的各种要素。书中每课都有对话、生词、句型、练习、替换表格、发音训练、情景。从德范克《初级汉语课本》共25课的练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结构语言学和听说法的影响,尤其突出的是每课都把对话放在首位,而把词汇放在其次,体现出把词汇放在语境里学习的方法。德范克的作品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语言(而不仅仅是汉字)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他仍然缺乏后来我们对语言的所谓“proficiency”的认识。在德范克看来,学习汉语的中心是学好汉语的生词、句型和对话。

四、现代语言理论对教学中心任务的影响

(一)乔姆斯基的理论

德范克的《初级汉语课本》出版五年以后, Noam Chomsky (乔姆斯基) 和 Morris Halle 出版了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SPE)*, 使他早先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研究 Universal Grammar 的过程中,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语言虽然千差万别, 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同语言之间只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语言规则, 而那些规则的不同是可以分类的, 而且有时候仅仅是规则的顺序不同而已。乔姆斯基认为只要掌握了人类不同语言的参数 (parameters) 和某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 每个人都有精通任何一种语言的能力。

乔姆斯基进而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能力: competence 和 performance。他所谓的 competence 指一个人理想化的母语能力, 而他的 performance 指的是那个人在语言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这种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表现是注重 grammar competence (语法能力) 的培养, 为西方语言教育学中的一些流派(比如翻译法、认知法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受此影响, 不少教材的编写把语法作为学习的中心。汉语教材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珣主编的《实用汉语课本》(PCR), 该书的编排按照语法的进展为主线, 由浅到深, 由简到繁, 对汉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二)语言交际能力

随着对语言和语言教学认识的不断深入, 学术界越来越认同一种观点: 学好一种语言不能仅仅靠掌握了那种语言的语法(广义的语法还包括语音、构词规则), 还要掌握语言应用中的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交际能力包括语法能力, 但是还应该包括其他方面的能力, 比如考虑上下文的能力 (textual competence)、施为能力 (illocutionary competence)、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等。这些能力的统称是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换句话说, 教学法出现了从以语法能力作为教学中心到以语言能力作为教学中心的转变。而对语言能力的测试、衡量与预期, 直接促成了 the AC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的产生, 它把这种能力分为了不同的等级。

随着语言学习的中心从语法能力向语言能力的转移, 很多教学法也经历了变革, 其中最突出的是 Proficiency-oriented Teaching (语言能力教学法) 的产生。这种教学法讲求真实 (authentic) 的语言材料、自然语言的环境 (language context) 和各种使用语言的能力, 包括叙述、描写、对比和抽象论述等。从各方面来看, 语言能力教学法的产生, 标志着教学法的一个新高峰, 标志着学术界、教学界对语言教学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

五、后方法论的出现

(一) 后方法的产生

在以 Omaggio 为代表的语言能力教学法出现以后的十几年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教学法的研究上不但没有太大的进展,反而出现了质疑。正当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合理时,却有专家提出一个惊人的问题:教学法是不是死了(David M. Bell, 2007)?从寻找最佳教学法(Prabhu, 1990),到超越教学法(Richards, 1990),到后教学法(Kumaravadivelu, 1994),都反映了对教学法的质疑乃至否定。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语言能力教学法既是一个进步,又似乎是教学法的回光返照。喊出“超越教学法”口号最响亮的学者当数 Kumaravadivelu(库玛)教授。库玛教授批评一切教学法,理由是教学法难以以不变应万变,而且不同教学法所产生的结果并没有本质的不同(Kumaravadivelu, 1992, 1994, 2003)。

库玛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在汉语教学界,有些大学坚持使用听说法,有些大学改用语言能力法,然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研究可以证明听说法不如语言能力法,反之亦然。教学法的进步(从注重文字、语法到注重能力)并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成果。基于这样的发现,库玛提出超越教学法(beyond method),其实质就是抛弃教学法,宣布了教学法的死亡。

(二) 后方法的教法举例

抛弃了教学法,语言怎么教呢?库玛(1992, 2003)在他的著作里回答了这个问题,而答案是很牵强的,甚至是令人失望的。他确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大道理应该说都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是特别有效的。比如,他强调要让学习机会最大化。库玛本人都承认那是一种明摆着的道理(“To say that is to state the obvious.”)(2003)。这种“明摆着的道理”并不能给人一个具体的指导。库玛把他的理论称为“macrostrategies(宏观策略)”,其实质是避开了很多教学上的具体问题和困难。教学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很多的问题需要一个一个去解决,这就像去西天取经,山要一座一座地翻,河要一道一道地渡,光指给一个西天的方向是取不到经的。

库玛教授也给出了一些教学的实例,以展示他的教法,但结果还是差强人意。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Episode 3.1 1: T (the teacher), S (students)

1 T: What are some other controversial topics, S4, can you try?